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屈志勤,冯慧卿^①

(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关键词] 理一分殊; 格物致知; 求实—实证; 批判—怀疑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28-04

朱熹的理学思想是宋明时期新儒学的典型代表。可以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儒家们已经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借着佛道冲击和农民起义冲击之双重冲击突破传统儒学框架,走向科学与民主之启蒙,还是回归传统儒学,重塑儒教权威,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宋明时期是底层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上层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拼死维护旧统治秩序的时代,朱熹及其他读书人毫不犹豫在这一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了:重塑儒教权威,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之路。故朱熹力排佛、道,压制下层人民利益诉求,重塑儒学权威,且把儒学改造成更精致、更完整的统治思想。但他同时也发现:在佛、道冲击下,儒学不能再固守传统的理论形式,没有任何创新与发展,否则儒家伦理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将逐渐淡化,而退出统治思想的地位。朱熹经其理论探索找到了一条改造并发展儒学的重要途径:利用佛道理论改造儒学理论,建构一整套更完整、精致的儒学理论体系,指引人们走出佛道、回归儒学。这一理论发展突出地表现在朱熹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来阐释儒学的心性修养理论——“格物致知”理论。经过这一新儒学改造过程,朱熹使儒学既具理论论证的深刻性,又保有传统儒家伦理的实践性和实用性,形成了朱熹式的新儒学——理学。而朱熹的理学(特别是其“格物穷理”理论)以其重理论论证、追根求源的思想,不期与近代西方哲学家追求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方法近乎完全一致。但由于朱熹和近代西方哲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不同,与他们研究理论出发点、方向、思维模式等都不同,终使朱熹的“格物穷理”理论未能真正走向提出科学理性精神和方法的方向,当然也就未能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启蒙式思想革命。

一 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与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方法论近乎一致

(一)理一分殊理论是朱熹格物穷理思想之理论基石

“理”是我国隋唐时期佛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朱熹借用了佛学“理”这一概念改造儒学,提出了著名的“理一分殊”理论。在朱熹“理一分殊”理论中,他用“理气相依”避免佛道之空虚寂灭,用“理本气末”确立儒家道理的神圣权威。

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理和气结合产生的,理是万物产生的原理,气是万物产生所用的材料。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1]他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2]

朱熹用“理”的本原性来树立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而为什么还要提出万物的产生必须依赖“气”这一具体质料呢?他认为,理产生万物必须与有形有状的“气”相结合,才能有所附着和承载,而不至于陷入空虚而无从说明和体现。《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与学生的对话:“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2]

朱熹以“理本气末”、“理气相依”的理论前提,构建了“理一分殊”理论:理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根本,而理一旦结合气产生了事物,理就融入到事事物物中,通过事事物物表现

[收稿日期] 2011-09-16

[作者简介] 屈志勤(1965-),女,四川乐山人,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

^①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出来,倘若没有理气结合产生的具体事物表现理,理将无形迹、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即无从认识和把握。他说:“不消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2]

朱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的论述与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提出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方法论近乎一致。王玖兴、贺麟在介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时指出:“‘现象学’的意义在黑格尔看来,就是由现象去寻求本质。当人们观察事物时,总是由外以求知其内,由表现在外的现象以求把握其内在本质;这就是现象学的研究。……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由用求体’的方法。‘用’指现象,‘体’指本质。中国哲学著作中有所谓‘格物穷理’,‘物’是现象,‘理’是本质,‘格物穷理’就有由现象穷究本质的现象学的素朴意义。”^[3]

(二)朱熹格物与致知统一的心性修养方法论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近乎完全一致

朱熹以其“理一分殊”论为理论基础,详尽阐释了儒学的心性修养理论——《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

第一,朱熹在与学生的对话中,阐述了为什么要格物才能致知?他提出致知须格物的向外求索的思想,与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大师们主张从外在客观事实出发探索科学理论的方向很接近。

朱熹认为,在人们认识过程中,人与物的作用各不相同,从而有明显的“主客体二分”思想。《朱子语类》记载:“张仁叟问致知,格物。曰:‘物莫不有理,人莫不有知。’”朱熹又说:“知在我,理在物。”而朱熹的弟子刘圻父曾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4]

而朱熹为什么如此重视格物致知呢?

朱熹认为,人心中要有明确的道德观念,才能有自觉的道德行为,从而随时随地按儒家道德规范要求说话、做事,所谓在“明明德”基础上,才能追求“止于至善”。他说:“盖天理在人,终有明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谓人合下便有此明德。”^[4]本来,事事物物上都有儒家的道理,每一个人身上也有儒家的道理,但朱熹认为,人要清晰地明白这一道理,还得向外考察事物。所谓“自家虽有这道理,须经历过方得。”^[5]“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这种强调向外求索(格物)致知的方法比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致知方法——反躬自省的方法有很大进步。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6]

如果朱熹格物致知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而能推广到认识客观事物,用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他所谓的“格物致知”方法论就已

经演变为科学方法论——求实、实证的科学方法论。但实际上,朱熹向外求索的目的和孟子向内求索的目的完全一样,只为修己,不为变物。朱熹强调格物的目的是为了检验事事物物之上都有儒家的道理,而对儒理充满敬畏,从而时时处处按儒家的道理行事、做人。“问:‘格物须合内外始得?’曰:‘他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虽在静处坐,亦须验个敬、肆。”^[4]

第二,朱熹与学生讨论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从而阐述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方法、途径,与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论大师的论述极其接近。

首先,朱熹认为,“格物”与“致知”有着本质的区别。“格物”是通过考察事物探知事物中一个个零细的道理;“致知”是将零细之道理整合为道理整体,再将它推广开来、举一反三。“剡伯问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穷其至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零细说;致知,是全体说。’”“格物,是逐物格将去;致知,则是推得渐广。”“问:‘致知,是欲於事理无所不知;格物,是格其所以然之故。此意通否?’曰:‘不须如此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极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穷究。如此,则终无所止。’”“格物者,穷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4]

其次,朱熹认为,“格物”要详尽、全面、丰富,“致知”要在“格物”所获的零细知识基础上顿悟、上升为“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大智慧。朱熹这种详尽、全面地考察事物,以获取丰富的感性材料,并重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知识的思想与西方科学方法论大师培根的观念几乎一致。

《朱子语类·大学二》中朱熹反复强调格物要越详尽越好、越仔细越好,要“格尽其物”、一层层格到尽头,且无论大小、粗精都要考察。“凡万物万事之理皆要穷。但穷到底,无复馀蕴,方是格物。”“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二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格物,是格尽此物。如有一物,凡十瓣,已知五瓣,尚有五瓣未知,是为不尽。如一镜焉,一半明,一半暗,是一半不尽。格尽物理,则知尽。”“且要见得大纲,且看个大胚模是恁地,方就里面旋旋做细。如树,初间且先斫倒在这里,逐旋去皮,方始出细。若难晓易晓底,一齐都要理会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纲,理会一重了,里面又见一重;一重了,又见一重。以事之详略言,理会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浅深言,理会一重又一重。只管理会,须有极尽时。”“问表里精粗。曰:‘须是表里精粗无不到。有一种人只就皮壳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无处。又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会。此乃谈玄说妙之病,其流必入於异端。’”“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后会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这便是理之一本处。”^[4]

朱熹认为,事事物物都格尽,零细的知识积累多了,“用

力之久”就会“豁然贯通”获得“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大智慧,而达“知至”的境界。他指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理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粗细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7]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为了获得内心透明了的大智慧,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违背儒家的道理。“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4]而朱熹认为,为了达到“知至”的境界,“格物”重要的不是“格外物”(考察客观事物),更是仔细研读儒家经典著作。他告诉学生要把儒家经典著作都仔细研读,每一句、每一字都不要漏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4]

总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因其既强调获取知识是以大量感性经验积累为基础,又强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上升的重要性、必要性,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近乎一致。培根指出:“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象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象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正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圇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这样看来,要把这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还未做到的),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希望。”^[8]

对此李约瑟曾指出:“除了亚里士多德和朱熹在概念上的基本分歧以外,他们的思想在这里并行不悖。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9]⁵¹⁰而梁启超更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不让于培根。“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10]

二 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与培根等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有着原则的区别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朱熹的“格物致知”方法论与培根等近代西方哲学家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从其思想立足点、引导人们求知的方向、达到的社会作用与效应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使朱熹的理论并未走向科学方法论方向。

(一)朱熹格物致知与培根的方法出发点不同

朱熹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理是人与物产生的源泉,而每一人与物身上又包含有理,故人求知(求理)不过是通过格物求自身内心之理而已。“问:‘天地之

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2]故朱熹认为我们格尽世间万物,是为了求证理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后反躬自省,在日常生活中对儒理怀有敬畏之心。

培根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要求人们要从客观自然事实引出科学理论来,其方法强调人们考察事物不能受主观的干扰,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规规矩矩按自然的指引做事。他指出:“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11]

(二)朱熹所致之知与培根所求之知不同

朱熹格物致知,所求乃伦理之知。“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虽在静处坐,亦须验个敬、肆。”^[4]由于他对自然对象的研究不感兴趣,他引导人们研究的终还是一些玄空的伦理观念,而没有引导人们去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培根提出新工具为求自然之知。“我的程序和方法,……我不是要从事功中引出事功,或从实验中引出实验(象一个经验家),而是要从事功和实验中引出原因和原理,然后再从那些原因和原理中引出新的事功和实验,象一个合格的自然解释者。”“在获致事功方面,人所能做的一切只是把一些自然物体加以分合。此外则是自然自己在其内部去做的了。”^[12]故培根提出的新工具——实验方法指引人们科学研究不断出成果。故梁启超指出:“综培根穷理之方法,无外两途:一是物观,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对于自然界至寻常至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是心观,当有自主有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虾,倚赖前代经典传说之语,先入为主以自蔽,然后能虚心平气以观察事物,此培根实验派学说之大概也。自此说出,一洗从前空想臆测之旧习,而格致实学乃以骤兴。如奈端因革实坠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腾而悟汽机之理,如此类者,更仆难尽。一皆由用倍根之法,静观深思,遂能制器前民、驱役万物,使尽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辉煌之世界。倍氏之功不亦伟乎?朱子之释大学也,谓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倍根。但朱子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详言其法,倍根自言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而其所下工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10]

(三)朱熹虽然批判佛与道,而不批判儒,终不能解放思想,启动一场指引人们走向科学与民主思想革命;而培根等西方哲学家们猛力抨击亚里士多德等的传统思想和方法,启动了一场引导人们走向科学与民主之途的思想革命。

李约瑟指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朱熹)很难把理论

设想成是完全独立于心灵之外的一个范畴,也很难摆脱这样一个观念,即一个计划者必定是在时间上先于并在地位上高于被计划的东西。因此至少就一个人格神而言,如果他没有明确加以否认的话,那么,他就多少会把自己置于通向有神论的解释的道路。在根本上,朱熹在以下这种意义上仍不失为一个二元论者,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或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我认为那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之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如果朱熹能够使自己充分摆脱这种偏见的话,他就会提前八百年预见有机唯物主义观点及其辩证的和综合的层次了。”^{[9]513-514}

总之,科学理性精神的实质就是求实—实证的精神和批判—怀疑的精神,培根等近代西方哲学的思想和方法是这种精神和方法的典型代表。而朱熹格物致知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的形而上学特质,使其“格物穷理”论与科学方法论擦身而过,终未走向真正提出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M].
- [2] 朱子语类:卷一[M].
- [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译者导言)[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9-10.
- [4] 朱子语类:卷十五[M].
- [5] 朱子语类:卷十[M].
- [6] 孟子·尽心上[M].
- [7]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M].
- [8] [英]培根.新工具:卷一·九十五[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 [9]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第2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 [10] 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4.
- [11] [英]培根·新工具:卷一·一、三[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 [12] [英]培根·新工具:卷一·一一七、四[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

On Zhuxi's Theory about "Extension of knowledge l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objects" and his "methodology of science"

QU Zhi-qing, FENG Hui-q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Zhuxi used Buddhist theory to put forward a new Confucianism's theory- "a logic behaves in every thing". From this theoretical source, he went deeply in to research the Confucianism's theory -"Extension of knowledge l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objects". He studied about the dialectic relation of investigation of objects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And his theory on "Extension of knowledge l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objects" is very close to modern methodology of science by Francis Bacon. But his theory was built on the idealism and the metaphysics, so it is not virtually modern methodology of science.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of objects; extension of knowledge; objectivity and testament; criticize and doubt